才子佳人的另一面

——论张恨水作品中的平民意识

陈广士 许思友

在张恨水的大部分小说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白日梦似的才子佳人的现实人生理想。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张恨水仅仅是一个生活在才子佳人的白日梦里的超人，相反，他从来没有完全地把自己摆在传统才子的地位上，透过他的小说作品，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躲藏在才子佳人背后的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的张恨水。

一、冷清秋与杨杏园——才子佳人外衣下的平民主义内核

在距《金粉世家》开始连载相隔14年后的1941年，有一位署名徐文滢的作者撰写了一篇名为《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的文章，他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史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的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它的前辈之上。” [1]从此以后，“民国红楼梦”的美誉不胫而走。然而，张恨水本人却并不领这个情，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有人说，《金粉世家》是当时的《红楼梦》，这自是估价太高。我也没有那样狂妄，去拟这不朽之作。……就全文命意说，我知道没有对旧家庭采取革命的手腕。在冷清秋身上，虽可以找到一些奋斗精神之处，并不够热烈。这事在我当时为文的时候，我就考虑到的。但受着故事的限制，我没法写那种超现实的事。” [2]

透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冷清秋是张恨水在这部小说里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一个人物。在这里，他把冷清秋摆出来以示作品与《红楼梦》的区别，联想到前人将这部小说当成“现代红楼梦”时，往往会将她和《红楼梦》中的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联系到一起，我们自然会明确张恨水的用意所在：正如《金粉世家》并非《红楼梦》一样，冷清秋也绝非摩登林黛玉。在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寄人篱下、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如果说林黛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贵族才女，那么，冷清秋则完全属于张恨水的那个平民世界，可见，这个人物正是这部小说区别于红楼梦的关键所在。

出身书香门第的平民才女冷清秋嫁到豪门金府，却难得地保持着自己的平民人格，她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刚和金燕西结婚时，她主动地加入金太太一起吃饭，不愿意和金府的其他人一样搞特殊化；日常生活中，她总是一个人看书习字，自得其乐，不愿与那些无聊的贵人们为伍；当她了解到金家人际关系的复杂后，就尽量不参与他们之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斗争；她与人相处时真诚相对，不会故意去应酬别人，也不像别人一样工于心计，背后处处给别人设陷阱。她甚至于刻意与上流社会保持距离，连他们的舞会也没有参加过，更不用说那些无聊的麻将和打牌了。从平时穿着来看，她衣着素洁淡雅，不事浮华。她知道自己的丈夫金燕西在外胡作非为，花钱如流水一样，却对此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她从不过问丈夫有多少钱，怎样去花钱，她不愿做一个俗不可耐的守财奴，也不愿和金府的其他子女一样心安理得地过寄生生活。在金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她简直是鹤立鸡群，出淤泥而不染，这与金府那些无所事事、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们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她的心高气傲的独特性格与丈夫金燕西的纨绔习气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她主动和金燕西离婚，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同丈夫的感情上，而是一个平民女子与自己不能认同的上流生活方式的决裂。

由于家世的关系，冷清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是作为一个民国时代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她的思想中又渗入了很多现代性的成份。无论是待人，还是处事，她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向往传统中国文化人那种隐居深巷自食其力的生活，又具有把真挚的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的现代女性情感追求。金燕西对她的多方追求让她感动，对美满幸福爱情的追求使她坠入燕西的绵绵情网，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追求自主、美好的婚姻理想的见证。婚后，在她受尽了丈夫的藐视和轻慢之后，冷清秋开始从自身的方面去冷静分析造成目前处境的原因，她在内心深深地省悟道 “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力，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 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进一 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心里好像在大声疾呼地告诉她，离婚，离婚！” [3]这个发自内心的呐喊，道出了一个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的心声，在痛定思痛之后，为追求自由，打碎婚姻的枷锁，讨回自己的人格，最终她毅然选择了逃离。因而，《金粉世家》之所以受到女性读者的格外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看来，冷清秋确实不是林黛玉，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平民才女，虽然嫁入了豪门之家，却能保持自己的平民本色。这样一个品貌双全的平民女子却不能见容于金家，这就形成了—种反差：大家世族的实质是世俗的，而寒门女儿的性格则是孤洁的。同时，正如野地里的小草总是比温室里的花儿生命力更强一样，冷清秋骨子里浓浓的平民意识，决定了其生命里不仅只有爱情，爱情的破灭不等于生命的结束，出走和死亡之间道出了冷清秋与林黛玉人生观的本质不同。在给金燕西的绝交信中冷清秋这样写道：“则读书十年，所学何事？夫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本不足怪。然齐大非偶，古有明训，秋幼习是言，而长乃昧于是义，是秋之有今日，秋自取之。” [4]在这里，她总结自己今天黯然离去的原因是不遵从“齐大非偶”的古训，“齐大非偶”是她对夫妻双方地位的分析，更是对自己平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如果说《金粉世家》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身处豪门的平民才女冷清秋形象，那么，同样被认为是张恨水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的《春明外史》则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饱尝人情冷暖的平民才子，他就是杨杏园。我们前面说过，杨杏园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张恨水把自己个人艰难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所有感悟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杨杏园的悲剧命运，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张恨水个人所意识到的抒一己之情怀的模式。中国的知识分子，常有怀才不遇的感受，场杏园正是千千万万郁郁不得志，事事不顺心的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两位主人公几乎有着同样的生活追求、人格素质和价值取向，这一切都来源于张恨水本人灵魂深处的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秉性和气质：身处纷乱噪杂的现代都市社会之中而能自甘淡泊、洁身自好；同情下层人的生活而又能对他们平等地真诚相待；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又感伤于自己的不平遭际。有意思的是，杨杏园在历经情感的折磨之后，沉浸于佛学之中以求心灵的平静，而冷清秋在饱受金燕西的冷遇之后，也躲进小楼潜心学佛。相同的作为中表现的是相同的感情需要，面对不如人意的现实，他们都采取了逃避的方式，希望借助虚无飘渺的佛教情境来达到内心的平衡，这也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

逐字逐句地仔细研读这两部小说，然后再以张恨水的自述和生平材料作参照，我们不难发现，张恨水对杨杏园、冷清秋均持有一样的欣赏、乃至认同的态度，这些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平民才子的张恨水自身性格的外化。

二、行走在“新”“旧”之间的平民人物

作为报人，张恨水一生奔走于全国各地，成名后他也曾接触过袁世凯的公子、张学良等许多政界要人，然而，他接触最多、了解最多的还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平民群体，他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均来自于平民阶层，这其中尤以和自己交往最多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众。作为一类文学形象，这类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同时又接受过民国时代西式的文化思想教育，最终往往面临两难取舍的尴尬处境，游离于新旧不同的时代潮流之间，他们渴望以一种无拘无束的新人姿态来面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意识的束缚，因而，当他们面对人生的种种抉择时就自然地会表现出种种异彩纷呈的姿态。胡适当年在论及自己的新诗时说道：“ 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脚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 [5]这段话虽说是为论诗而说，却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时代造成的这类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应当可以称得上是张恨水对这类平民知识分子性格的最好总结。范伯群先生曾经谈到：“杨杏园是生活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却是‘新旧合壁’。他曾和挚友何剑尘大发议论，认为只有找一位新旧‘二者得兼’的妻子，才算‘十足美满的婚姻’，他强调女子‘不能解放过度’。他以‘一律忍耐’来律己，又以‘不能解放过度’来求人。所以他笔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新事物，往往是被扭曲了的。这其实正是新文化运动缺乏忍耐和解放过度的结果，……杨杏园看来确实是个‘乍新还旧’的人物，他不失为是一个具有旧道德的老成青年，他崇尚的不是新文化新道德，而是一种‘改良礼教’，因此，他的思想实质是‘似新实旧’的。杨杏园所迫求的理想人物李冬青就是一个‘不脱旧礼教羁绊之女子’，而这位‘两重人格’的主人公是明显地向旧礼教方面倾侧的。” [6]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杨杏园才华横溢，道德高尚，面对这样一个弊端丛生的社会，他选择了坚守贫困，绝不与社会种种恶势力同流合污。他对比自己地位更低下的贫苦的民众抱有深刻的同情，这完全符合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温、良、恭、谨、让”的所有特征。然而，这样一个人格完美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事业平平，经济上几乎穷困到无以养家的地步，爱情上也同样如此，他无力从老鸨的淫威下救出自己心爱的梨云，却只能看着她凄凉地死去，最后只能以在她的墓碑上写上“未婚妻”三字的方式来进行虚无的安慰；他爱恋多才多情的才女李冬青，却无法打开她心头的死结，最终也只能与她阴阳两隔……造成所有不幸的原因，正是根植在他灵魂深处的新旧之间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思想上的高度清醒和行动上的极端软弱，他虽然认同进步思想却绝不去积极倡导。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杨杏园总是把自己的不满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而不愿去得罪任何人。当他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时，同样还是那样毫无作为，他喜爱的妓女梨云死了，表面上看上去是因为自己的贫困，无力出钱给她赎身，但实际上更是因为他除了为这段感情忧思感伤之外，并没有作任何积极的争取，他的朋友何剑尘不就是通过多方设法，最终得以与心爱的妓女终成佳偶的吗？有意思的是，杨杏园恰恰就是帮助何剑尘取得爱情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他自己却从没想过要去借鉴一下朋友的经验，由此看来梨云的最终结局，对杨杏园来说是不为也，而非不能为也。

当他面对多才多艺的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时，主动争取的西方现代思想似乎在他的行动中占据了主动的位置，他主动地向这位才女表达了自己的倾慕之情，但身有暗疾的李冬青还是压制住自己的真实感情，断然地拒绝了他的求爱。那么，杨杏园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吗？事实上，如果杨杏园能够勇敢地冲破遮盖在尊重面纱下的软弱，坚持继续向李冬青求爱，我们很难说他们之间的结局不会出现另外一番情形。然而，杨杏园没有那样去做，传统中国人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文化品格，让他至死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可见，两场姻缘最终化为泡影的终极原因还是他身上两种文化交互影响所造就的毫无立场的处世态度。

对于时代转换过程中平民女性人物的命运问题，张恨水同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李冬青、史科莲、沈凤喜、常小南等女性人物的不同情感结局和悲剧命运，无不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现代文明之间展示出作者的彷徨与无奈。

李冬青是个文学修养和个人涵养都极高的女才子，她个性独立，自尊自强，宁愿与孀母幼弟一起艰难度日，也不愿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当她的好友史科莲因身世不幸而发愿作尼姑时，李冬青这样劝阻她：“……现在的女子，一样可以谋生，遇到什么困难，要在奋斗中去求生活，怎样说起那种讨饭无路，靠木偶求生的事？” [7]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个自尊自强的李冬青，她的内心深处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约束，她自始至终都以消极绝望的态度来面对自己与身俱来的隐疾，她不敢正面面对杨杏园对她的爱情，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承受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即使是沈凤喜、杨月容、常小南等生活在贫困线下，文化程度很低的女子，在她们的身上同样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女性觉醒意识，她们不再接受封建贞操观念的左右，却又陷入了腐败堕落的上流社会用金钱所布置的罗网，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男权社会附属品的地位。沈凤喜这个人物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小有名气的大鼓女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几天之后，人们就看到了田、高新婚合影，照片中的高翠兰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勉强的神色。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将女儿视为摇钱树的高翠兰父母将田旅长告上了法庭。法庭会审过后作出了这样的判决：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到此结束，似乎高家得到了正义的支持，然而事后的高翠兰虽仍然还唱大鼓，但形容却日渐憔悴，性格也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还不时地同父母哭闹，可见其并未曾忘情于田旅长。张恨水深知这一类女子的性格，又无法相信军阀的虚情假意，所以，他最终只好让沈凤喜发了疯；《夜深沉》中的杨月容几度回头均没有成功，这表面看来似乎应当归罪于阴错阳差的命运，然而她之所以在温柔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又何尝不是其性格使然。

三、道德是非价值判断中的平民立场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作者直接站出来进行评判，还是作者躲藏在幕后，通过小说的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来暗示自己对人物的态度，针对小说人物言行举止的是非价值判断总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的是非价值观或多或少地还会影响到他的读者。由此看来，作者本人的道德价值判断对一部小说的影响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对任何事物作出的价值判断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价值观立场标准上的，张恨水当然也不例外，构成他是非价值立场标准的基础同样还是平民意识，或者说，张恨水是站在平民意识的立场上来进行是非道德价值评判的。

这种价值判断首先体现为对强权者的讽刺和否定，作者本人新闻记者的身份，使得他能够接触、了解许多对于一般平民来说非常神秘的上流社会生活，特别是政府高官的生活。这些人物上至统筹全国政务的国家总理，下至政府各部门的总长乃至于下层官僚。在展示这些人时，作者并不是如一般读者所想象的那样去展示他们侯门深处的某种隐私，而是平淡地叙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自己不作任何评判，然而对他们的讽刺和否定态度却跃然纸上。《金粉世家》中的金铨，身为国家总理，家中除了正妻之外还纳有两个小妾。他的几个儿子就闹得更不像话了，他们家有美妻，却让她们独守空房，自己在外面或寻花问柳，或偷偷娶妾。在《春明外史》里，那个叫做范统的总长，花了一千块钱，赁了个妓女充当临时姨太太，还好意思冠冕堂皇地去参加什么选美大会。为了官复原职，下了台的财政总长闵克玉竟然无耻地授意自己的姨太太，向魏大帅的红人秦彦礼运动运动。另一个典型人物卫伯修，竟然无耻到将自己的妹妹和妻子送到军阀鲁大帅的专车上去给他解闷，作为回报，鲁大帅不但让他恢复了他的官职，而且还把他从原来的段长提拔到了副局长的位置。掌管几十万大军的督理关孟纲进京晋见总统，竟然带来了四五十名妓女，“公平”地分配给他的那些同僚们。通过对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的描写，张恨水无情地鞭挞了这些达官贵人们丑陋的内心世界。

与些相反，对于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却能够不为金钱所惑，不为权势所屈，坚守正直善良人格的平民人物，作者总是打心底里表现出对他们的赞赏。《金粉世家》中的女主人公冷清秋，她的清新脱俗，她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的坚定、执着，她的善良、识大体，她的文采、聪慧等等无不让读者难以忘怀。她虽出身贫家，然而身处豪门却表现出坚定的自尊，为了爱情他丝毫不顾门第的差距可能带来的痛苦，当发现和金燕西的爱情再也无所维系的时候，她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离开，豪门生活没有改变她高洁的人生信条。《美人恩》中那个贫困潦倒的常居士，虽然双目失明，家徒四壁却能不为金钱所惑，坚决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卖给”总长公子玩弄。主人公洪士毅的父亲这样教诲自己的儿子：“你记着，一个人怎么样没有本领，也可以卖力吃饭，就是良心要紧。没良心，穷了会出乱子，有了钱，更会出乱子。你的父亲，不像别的父亲，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你要记得我的话，你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8]虽然这位老人早已去世，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在作品情节中，但他那朴实的临终遗言还是及时地阻止了洪士毅的不良意图。

对于那些为穷困所迫，有时难免也会做些坏事的人，张恨水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痛恨他们的堕落，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对他们情不得已的同情。《美人恩》中常小南的母亲唯利是图，一度对洪士毅恩将仇报，但当她为了摆脱穷困，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卖”给公子哥儿陈东海时，作者特别描写了她手拿钞票，豪淘大哭的失女之痛，其同情之意不言而喻。《小西天》中的妓女杨浣花为了换取一张能够帮助自己脱离苦海的的车票，不惜助纣为虐，帮助一时性欲冲动，花个百十来块钱，找个女孩子解解闷的贾多才骗买了贫家女孩朱月英，作者借用程志前那个冤屈死了的鬼找替身的比喻狠狠地把她讽刺了一番，继而又通过她与程志前的一番谈话，道出了她自己的不幸经历，并表现出她的后悔与无奈，通过程志前对他的安慰与小小的资助，作者表达了对她错误行为的理解和对其不幸身世的同情。

相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道德价值判断而言，张恨水无论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和揭露，还是对美好善良的人格力量的赞颂，都能够感应时代人生跳动的脉搏,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光芒。作为一个与时代现实最为接近，能够敏感地把握时代脉搏的报人，张恨水富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的精神，他反思历史，关注现实，用自己羸弱的身躯肩扛起沉重的对平民的道义与责任,并且坚毅而执着地将思想的触须伸进生活的厚厚沃土里。而不是象传统文士那样，在同情百姓疾苦、指责官员贪暴、怨恨君主昏庸的同时，总是将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同情者的姿态俯视着可怜的芸芸众生。张恨水的平民意识，追求的就是这种骨子里的忧百姓所忧，愤百姓所愤，喜百姓所喜，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的文人良心。

张恨水小说中平民化的才子佳人倾向是与其本人人生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长期以来的传统小说影响让他从小就做着才子佳人的梦，个人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和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又使他与那些平民“小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他的笔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社会下层，开始着意地去表现那些挣扎于贫困线下的小人物，表现平民世界的喜怒哀乐。于是，他笔下的才子佳人也自然地带上了平民色彩，平民化的才子佳人让张恨水小说的人物世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参考文献:

[1] 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125.

[2]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46-47.

[3] 张恨水. 金粉世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1060.

[4] 张恨水.金粉世家[M].上海：世界书局，1931：28页.

[5] 杨义等.中国新文学图志•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15.

[6] 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 [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39.

[7] 洪江.张恨水文集之春明外史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56.

[8] 张恨水.美人恩[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48-49.

**作者简介：陈广士、许思友均为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